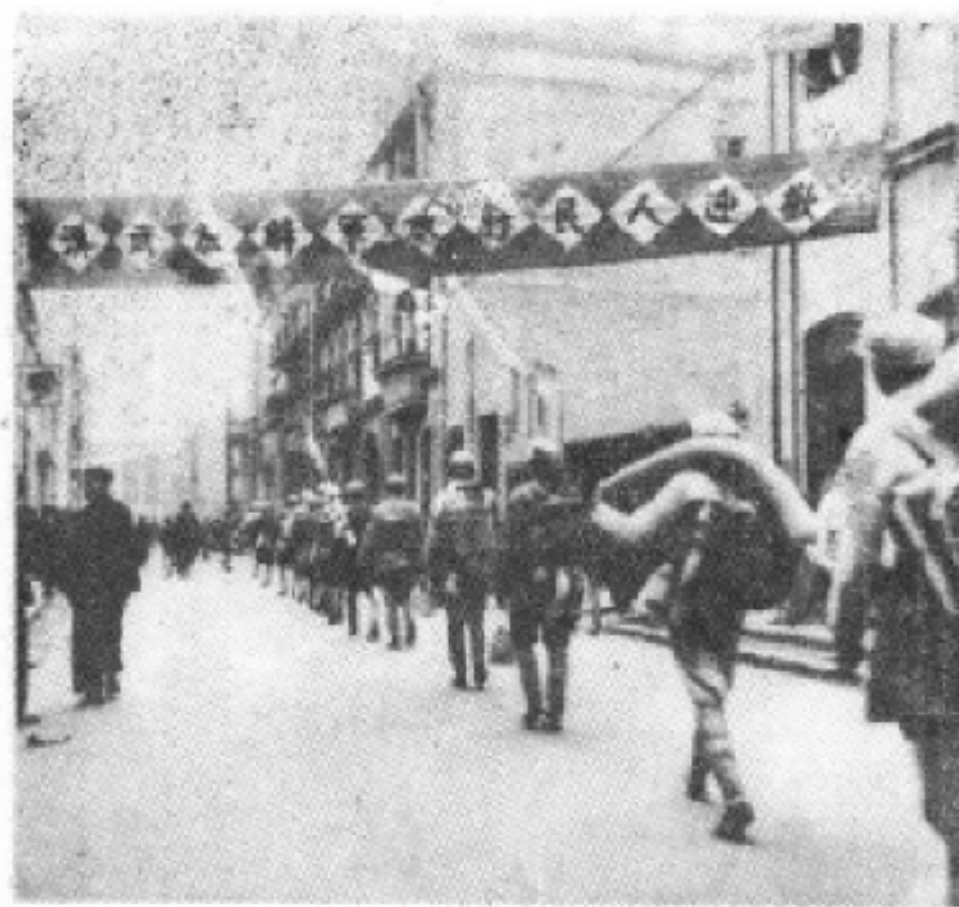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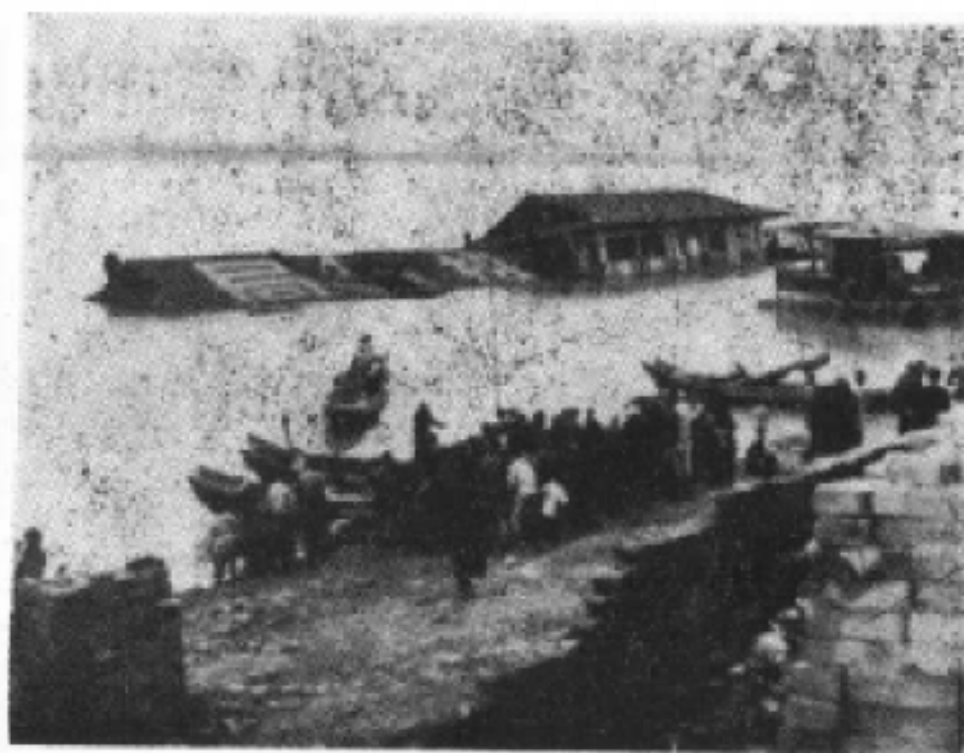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

六日，武汉解放，图为
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情形。



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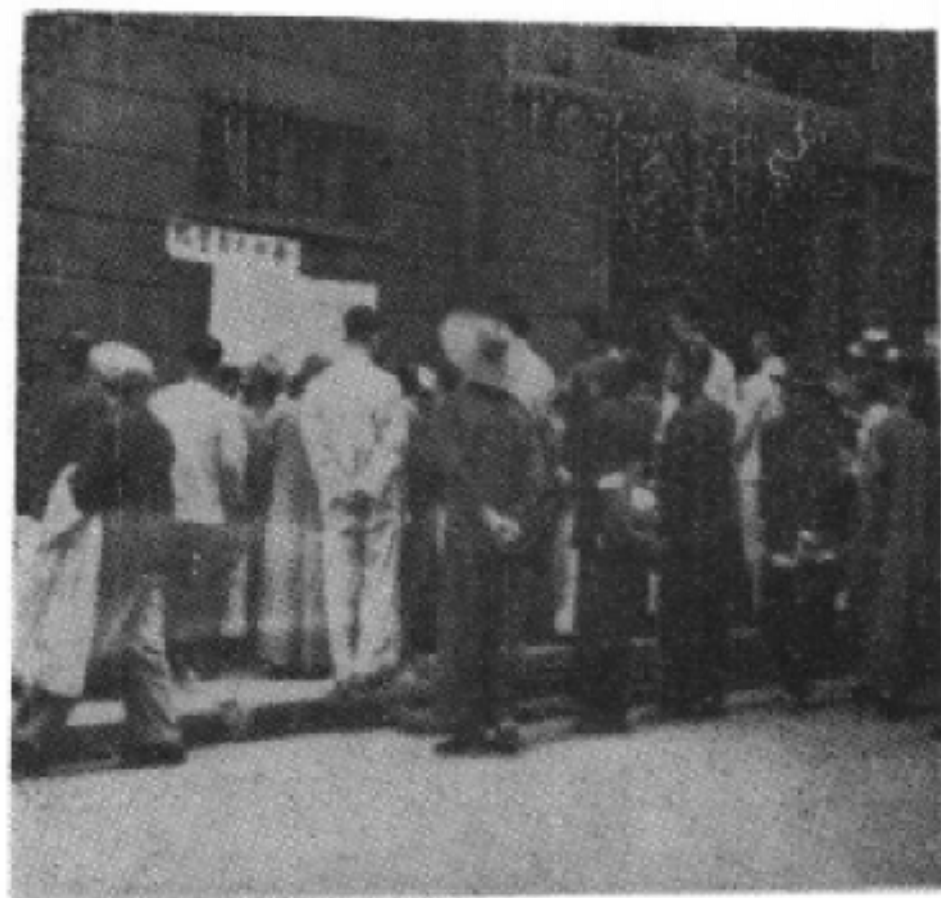
队将码头趸船炸沉入江中。



武汉解放初期，秧歌队上街进行宣传活动。



武汉市民观看解放军张贴的布告。





武汉各界隆重庆祝武汉、上海等全国六大城市解放大会会场。

（以上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武汉市博物馆提供）

目 录

为解放武汉与党共同战斗的岁月·····	陶迷营 (1)
解放前夕的劝告·····	郑南宣 (5)
回忆湖北地下民革的组织建立和活动·····	程一新 (7)
一次难忘的香港之行·····	傅醒林 (16)
解放前湖北省府公务人员斗争片断回忆·····	许克勋 (19)
李健侯在武汉被捕前后·····	李修鲁 (22)
保产护厂迎解放·····	黄昊松 (24)
明知故放共产党人·····	邹正芳 (27)
回忆湖北省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初期活动·····	谈 瀛 (29)
湖北省武昌县民盟组织地下活动记略·····	肖连城 (33)
解放前夕民盟组织在咸宁·····	郭松坡 (37)
武汉解放前一段工作的回忆·····	张云晃 (42)
地下民盟战斗在湖北审计处·····	胡肇民 (49)
武汉解放前民盟在湖北省公路局的活动·····	林寿松 (51)
解放前我参加民盟地下活动的片断回忆·····	王铭鼎 (53)
解放前湖北民盟在《正义报》的活动·····	胡盛田 (55)
武昌医师公会解放前活动的片断·····	林克楠 (58)
聂国清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轶事·····	聂菊荪 聂碧莲 (61)
解放前后的回忆·····	赵厚甫 (63)
解放前后的武汉工商界·····	王际清 (67)
“裕大华”解放前夕经营事略·····	黄师让 (73)

我从香港回到武汉的前前后后.....	程子菊 (75)
回忆湖北解放前后民建的工作.....	金斌统 (88)
我将毛主席的密信送给程潜.....	陈大襄 (97)
记武汉解放前夕围缴国民党溃兵枪支事.....	曾子忱 (104)
珞珈山斗争生活片断回顾.....	王家才 (106)
回忆武汉大学“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	万群 薛麒麟 周勇访问整理 (112)
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地下斗争纪实.....	汤正刚等十四人回忆 (116)
武汉解放前大公中学的革命活动.....	朱贡西 (123)
回忆解放前夕的“武汉大教联”.....	丁裕超 (127)
“教与学社”活动始末追记.....	廖杏轩 (130)
解放前夕武汉工人反搬迁、反破坏、保产护厂斗争梗概.....	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132)
解放战争时期平汉铁路地下工运斗争概况.....	集体回忆 (144)
解放前夕武汉码头工人斗争散记.....	萧致治整理 (153)
解放战争时期黄石的工人运动.....	张维明 杨福潮 (158)
我参加过的源华煤矿护矿斗争.....	陈正宜 (172)
华新水泥厂的护厂斗争.....	彭咸若 黄有丰 (174)
解放前夕沙市邮工反饥饿斗争纪实.....	张显鄂 陈仲和 (183)
解放涪水及支援大军渡江中的工人阶级.....	汪启发等回忆 (189)
解放前夕武汉的《民言报》.....	孙 琮 (193)
武汉记者赴延安参观纪实.....	潘怀周 (196)
发轫于武汉的青年救国团宁波起义.....	杨 俊 (199)
忆黄石港起义.....	陈基培 (203)

解放初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一段回忆·····	沈汉民(211)
开辟汉南或编民变武装之亲历·····	吕卫民(214)
解放沙宜文前工作的回忆·····	赵传祖 裴顺富(222)
五峰县剿匪琐记·····	赵承贵(225)
追匪记·····	陈丹彬(234)
原国民党七十九军荆门覆没记·····	方 靖(240)
荆门战役中方靖被俘记·····	李印玺(250)
恩施解放前夕的湖北省政府·····	王炎森(253)
解放前夕亲历的点滴回忆·····	梁上贤(266)

为解放武汉与党共同战斗的岁月

陶 述 曾

1948年底，我从广州港工程局回到武汉，通过汤允青与党的中原局接上了关系。那时，我家住在武昌长湖南村二号。1949年元月份的一个晚上，中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张春阳同志来到我家。虽是初次见面，然交谈甚为恳切，他认真听取了武汉科技界人士的思想情况，并决定由我去联系在汉的棉花研究所专家张天翼、水稻专家邓克奠、建筑师鲍鼎、民生公司化工总厂工程师黄超等人。我提出：黄石为湖北的重工业基地，那里三个大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我的同学和友好，因此，由我亲自去同他们联系。

2月初，我在黄石会见了汉冶萍冶厂总经理张松龄、源华煤矿总矿师宋自修、华新水泥厂经理王涛及土木工程师郑跃西等人。由于我家是源华煤矿的创办股东之一，以后黄石方面又一再想以高薪聘我任职，是故我在黄石的好朋友不少。老友久别重逢，喜不自禁，互相询问了近况后，我说：“不久，黄石必成为大军过江的渡口，由盛洪乡往贺胜桥有一条贺胜公路，是截断粤汉铁路的捷径。我们的事业正在战争的节骨眼上，应当早作准备。今幸与中共中原局有了联系，我们应该维护好设备，不让搬走、不让破坏，安心生产，静候解放军的到来”。“我估计白崇禧未必有力量在黄石设防……”。大家听后很高兴，也同意我对解放战争前途的看法。我在黄石停留了两天就回武汉了。在我的影响下，黄石的同学、友好，纷纷行动起来，与其他进步组织、

进步职工一道，使各人所在的工厂矿山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王涛的华新水泥厂还加快了建设速度，好在1949年以前竣工。

1949年2月下旬的一天，老友朱怀冰来到我家，说他的堂弟朱鼎卿出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特来邀我相助，出任建设厅厅长。我说：等我思考思考再作答复。次日，我向城工部的张春阳同志作了汇报。他说：“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保护城市、工矿、企业少受破坏或免受破坏”。于是，我立即找到朱怀冰，答应了邀请。这样，便在当月的26日，由我接任了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职务。

我上任后没两天，朱鼎卿便对我讲：建设厅秘书张云冕恐与共产党有关系，要注意张的行动。并说已把张送进训练班受训，以便调虎离山。我却说：“张云冕与共产党有关系，按你所掌握的情况还不尽可靠。送训练班是打草惊蛇、让张回来，并作些安抚工作，还便于监视”。朱未置可否，我趁机立即调张云冕回建设厅，以后又让其管理搬迁及机关档案工作，使其有可能并更方便地保护好档案，以完整地向党移交。

朱鼎卿上任伊始，就派朱怀冰往恩施经营，并拟拆迁一部分工厂以及中学以上的学校搬去，还想请几位老先生同行。他把这项计划称之为“应变”，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却说：“武汉大学共产党多，不要管，也管不了。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等人反对去恩施，我有什么办法劝说他们？”“至于迁厂，运送档案、学生……我当尽力而为”。稍后，朱鼎卿即以省主席名义，在湖北省银行请客，欢迎并希望湖北耆老一起去恩施。张难先大发其火地说：“你想把我们这些老骨头拖垮”！弄得朱狼狈不堪，只好草草收场。

为了应付朱鼎卿的“应变”，我调派了载重量一千吨的“武昌号”轮船，把一些恩施籍的学生和省政府的陈旧档案以及电报局的废旧器材，装船开往宜昌。并示意船长，认清大局，善自为之。

后来，“武昌号”在这位船长的率领下，在宜昌起义。此外，我还另派了一艘登陆艇运卡车往巴东，运输部门只挑选了十二部破旧卡车以及破旧的交通、通讯器材装上去，以搪塞朱鼎卿等人的检查。

4月下旬，刘先云已去恩施，朱鼎卿仍在武汉。我为了反搬迁、反破坏冒着风险，接过朱鼎卿“应变”的口号，借搬迁要有计划、有步骤，严防中饱私囊，以及要安定民心，搬迁后又要及时恢复生产等为由，背着朱鼎卿以建设厅厅长名义手谕：“命令所属机关、工厂、企业，没有接到本厅长手谕，任何人不得搬动，如有捣乱破坏者，严惩不贷。”此时，中共中原局城工部的地下工作也已深入到各工厂、企业、学校。因此，我的手谕，便使建设厅下属部门的同志得到了公开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隐蔽的地下斗争变为合法斗争。这些影响，还波及到一些学校和其它一些单位和部门。

当时的金圆券贬值，一日三变，物价飞涨，省属职员每人每月只能发四斗米维持生活。朱鼎卿是第九补给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手上有银元。我便以建设厅的名义，向他借了一万五千元，又从源华煤矿调拨了一千吨煤炭，全部用于维持内河航运工人的生活。

5月12日，我为搪塞“应变”，正在省政府召集担任运输任务的职员开会。朱鼎卿匆匆进来，很气愤地说：“赶忙行动，开什么会！”于是会议结束。我借口到汉口布置检查工作，因觉情况异常，晚上也未回到武昌家中。果然，当天夜里省政府便派建设厅的秘书刘某（我的远房亲戚）来我家找我，说：“朱鼎卿同民（政）、财（政）、教（育）三位厅长都走了，临行囑咐陶厅长回家，让他赶到咸宁会齐同往恩施。现在外面都知道他们要走了，文教界许多人聚集在教育厅，陶厅长回，最好不要到省政府去”。我内人向颢秋说：“这是叫他丢掉老母、妻子而一个人逃命，不行。请你天亮前到江边等他，告诉他这些情况，并说我们按原打算，迁往隔壁省一女中（即现武汉第三十九中学）去住

了，一切让他放心”。原来，5月10日晚九点多钟，有关方面派一位中年人来到我家，告知：“武汉快解放了，遇有紧急情况，你们全家都可到隔壁的省一女中去”。5月初，张春阳同志也曾动员我随朱鼎卿迁往恩施，说那里有工作可做。我说：“我有九十岁的老母亲，曾随我逃难八年之久，我实在不忍离她而去，请能原谅！春阳同志点头同意后并说：“那也好，武汉如‘真空’，你全家可到玻璃厂去，工人群众会保护你全家老小的！”

到我家报信的刘秘书，一大早就在武昌江边等到了我，并告知了有关情况。闻后我想，既然我不愿到咸宁与朱鼎卿会齐，家中老小又都安顿妥当，自己则应该隐蔽起来。于是我就原船回到汉口，迳直躲到我堂妹吴陶然家中去了。

我在吴家住了三天，恰遇上源华煤矿公司董事会召集在汉董监会议，于是欣然前往。会议由驻会董事张东初主持，他说：“徐董事长（即徐源泉）已离汉半年多，估计不会回来了。现在沪汉交通梗阻，矿上虽然照常生产，但煤炭销不出去，积存多，公司经济困难。时局如此，前途如何？”我说：“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源华几经磨难，现在幸存，还有三千工人照常生产，如果一时经济困难搞垮了，怎样向新政府交待？”于是大家把话题转到如何为渡过难关作贡献上来。王季良矿师说：“源华现存的黄恩湾煤田，蕴藏量只够开采一年多，要赶快设法把新井搞上去。”……会议结束，是推我继任董事长，王季良为经理，张东初、张润轩为常务董事。并决定董事会留在汉口，公司搬到矿山，三天内开始行动。

散会后，回到武昌家中，老母亲、婆媳等也都从省一女中回来了，对于学校师生的热情关怀，使我家老少几代长久难忘！

晚上，我内人问我：原给你高薪都不愿回源华煤矿，怎么现在当起董事长来了？我笑着对他说：现在百废待兴，国家要建设，我们要为新政府分忧啊！

（熊辉 整理）

解 放 前 夕 的 劝 告

郑 南 宣

1949年5月15日下午五时许，当时任汉口市公安局局长的李经世打电话到我家中，约我于晚餐后到他住处岳飞街晤谈，但未说明是为什么事。我如约前往，见李经世在门外徘徊走动，他见我到来，即以手指示叫我进到房里去，他自己仍留在门外。迨我进到房里，见有晏道刚、彭进之、及汉口市市长晏勋甫三人已先在座。我一进房，晏道刚、彭进之即起立说：好好！南宣也来了。他二人又说：勋甫要走，我们劝他留下，不要走，你也帮助劝劝他。我与晏勋甫相识已久，1947年秋，我与晏勋甫及当时任湖北财政厅厅长的吴嵩庆、建设厅厅长的谭岳泉一起出差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共同生活四个多月，以后也经常见面。晏道刚是晏勋甫的叔父，彭进之是晏勋甫的保定军校同学，他们的关系较深，那天晚上劝晏勋甫不要离开武汉，他们是主要力量，可能知道我与晏勋甫有交谊，就约我去帮助劝说。而且彭进之与我有较好的友谊。当晏勋甫说明他要走的理由是怕共产党把他作为俘虏看待，要他上广播电台广播。他并且要将汉口警察大队带走。我劝他说：你不走，维持了汉口秩序，使汉口得到和平解放，汉口市民是会感激你的。共产党也会认为你有功，当作起义人员看待，怎么会将你当作俘虏呢？这是不必顾虑的。至于警察大队是市民纳税养活的，正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岂能带走？你留下，警察大队帮助你维持汉口秩序，共同为市民立功，这是上

策。晏道刚、彭进之都进行有力的劝告，我先离开岳飞街。结果晏勋甫还是留下来了，并且做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现在晏道刚、彭进之、李经世、晏勋甫四人均已先后去世。未免这一史料湮没，特简述如上。

回忆湖北地下民革的组织建立及活动

程 一 新

我从湖北地下民革成立及至解放，始终是民革的专职干部，并负有与民革中央通讯联络、上传下达之责，还担任了民革及民促、民联的外围组织“精诚新闻社”的社长职务，故而对湖北民革地下组织情况知之较详。值此湖北解放四十周年之际，对湖北地下民革的组织建立及活动作一回忆，谨以纪念。

一、湖北地下民革的组织建立

自1938年起，我即与王葆真（字卓山、我辈亦尊称卓伯）经常保持联系。1946年3月在重庆，他介绍我参加了一些民主活动，并指示我马上返回武汉，尽快恢复“汉口精诚新闻社”，作为筹组民革组织的班底。同时积极串连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共同拥戴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此作为共同的行动纲领。

4月，我独自回到武汉，5月28日接到王葆真自重庆的来信，大意是，抗战八年，胜利还都，将乘民联轮东下。同行的有冯玉祥夫妇、李济深、谭平山、王宠惠、庞钟麟、田竺僊等，将与武汉同志见面畅谈。我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容景芳，并通过他联系了其旧部朱旭东、马骥、朱汉涛，以及祝润澍、傅懋初、陈次中、陈云五、李经世、汪以南、汪世铤、韩万春、范奔公等各界名流，容又商借了汉口交通银行（现武汉市财政局大楼），作为李济深等人的下榻之地。6月1日下午，李济深、王葆真一行

抵汉，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在短暂的逗留期间（2日清晨，即离开了武汉），王葆真再一次指示我，要尽量邀集些志同道合，意志坚定的本党同志，组织起来，在李济深等人的领导下，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平等、反对压迫，并为之奋斗不渝。李济深也面嘱容景芳，要同我一起尽快把“精诚新闻社”恢复起来。

容直接听了李济深的意见，李、王走后，我便将王葆真的指示向容景芳、祝润湘作了传达，并开始酝酿成立组织。这年冬天，王葆真奉李济深之命再次来汉，一方面检查布置工作，同时协调即将成立的“民促”组织的负责人选。1947年春，王葆真第三次来汉，在汉口友益街54号祝润湘家中，主持召开了民促汉口分会的成立大会，选出容景芳为该会召集人，祝润湘、曹天铎、傅盐梅、傅慧初、范奔公、韩万春为理事。祝润湘负责组织，吴汝尊任秘书、我负责交通联络、宣传和担任“精诚新闻社”社长。同时指示我们，要将策动现役军人起义作为主要的工作任务。以后，容景芳、祝润湘或每月、或隔日，不定期地召集马骥、汪以南、傅盐梅、徐凌云、傅慧初、范奔公、肖连诚、陈大中、周小轩、李任夫、吴在田、陶铁夫、夏鼎、曹天铎、童少阳、周光宗、罗英才、陈维林、韩少周、韩万春、朱柏青、方克猷、柏启元、程一新、朱涤华、陈云五、李经世、汪世鏊、陈中介、吴汝尊等人集会，每次人数不等，地点多半在汉口铭新街18号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朱涤华是该会的负责人，现为大智街办事处），或汉口岳飞街23号容景芳家中，或武昌银元局马骥的家中，偶尔也去武昌涵三宫陈中介家中。

1947年11月，王葆真派其子王亚东来汉，密邀我去香港参加民革中央成立大会。与会的湖北籍代表还有梅龚彬、田竺僧、曹天铎。会议产生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和民革中央组织机构。梅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曹被选为中委、我被选为

中央候补执委、田则参加了军事组的工作。大会期间，我还与曹天铎参加了民促中央的两次会议（在香港蔡廷锴的私宅召开）。离港时，民革中央交我两项任务：1、建立民革湖北地方组织，推选召集人；2、专司与中央的秘密联络之责。

回汉后，我即向容景芳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向“民促”、“民联”以及“民主自由联盟”的同志进行了传达。当时在汉的容景芳、祝润湘、傅盐梅、傅慧初、朱旭东、范奔公、吴汝尊、李西屏、陈中介、汪以南、李经世、陈次中、马骥、汪世璠、程一新、朱汉涛、罗英才、韩万春等便在容景芳家中开会，成立了民革湖北省支会汉口分会筹委会。公推容景芳为主任委员、祝润湘负责组织、吴汝尊任秘书，我负责与民革中央通讯联络及担任“精诚新闻社”社长，还兼作“民促”汉口支会的理事、主持其日常工作。上述人选经报民革中央常委会，得以复电批准。

1949年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支会汉口分会正式成立，并在报纸上发表《成立宣言》，呼吁和平团结。至此，完成了民革湖北地方组织的组建工作。

二、“精诚新闻社”

“精诚新闻社”是湖北民革、民促、民联在地下时期进行宣传和其他活动的掩护机构，也是地下民革与香港总部和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的联络总站。它原是我在抗战初期，跟着祝润湘办报而建立起来的通讯社。武汉沦陷后，通讯社星散，我也流亡去了重庆。胜利复员时，我托熟人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吴国桢活动，得以批准返汉恢复，还出我意外，收到了居正、戴传贤、孙科、童显光、张群、白崇禧、于右任、贺国光、张继等国民党要人寄来的题字，为日后恢复社务工作得到不少便利。

1946年10月，遵照李济深、王葆真的指示，我们成立了恢复“精诚新闻社”的筹备班子，由容景芳任该社董事长，范奔公

(当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英文秘书)、韩万春(韩安祥铁号经理)任董事,我任社长,社址在汉口协隆里5号,继迁杨子街新德里4号,再迁天津路联怡里31号。但真正的办公地点是在私营灿华煤矿公司(合作路30号),后来这个公司在民意二路148—150号的办公地点也成了我们办公的地方。秘密印刷所则是在民主一街111号的精华印字馆。

1947年4月,“精诚新闻社”正式挂牌,开展业务。开始仅有程一新(社长)、袁斌甫、王导民(编辑)、雷醒华(记者)、王文灿(地下团员)、袁竟、黄祥云(刻字工)七人,以后又先后聘请了陈树藩(编辑,后再聘为编辑主任、王文灿介绍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田孝然、吴平、田润生、胡旭、董明浑(是陈树藩介绍的,都是中共江汉三地委成员)、董斌、童秋枫(记者)、刘顿、王耀庭(特约记者)、柏枫、叶守义、傅醒林、盛代明、陈敏、吴测中、谈青云、王明发、祝成钦、吴泽善、潘忠尧、李执宁等,到1949年上半年,人员几乎近百,其中特约记者占大多数。为此,重新调整了组织机构,增补袁角方任副社长,李宗焕为印刷主任,以后又采纳了陈树藩等人的建议,在武昌、汉阳、宋埠(麻城)、武昌挹江区(今徐家棚)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分由董斌、陈群、胡旭、王文灿担任办事处主任。

人员增加以后,“精诚新闻社”仅靠发消息的收入,远远不够开支,我们又无更多开源的办法,后来竟致连笔墨费也开支不出。无奈,我只好向特约记者们募捐,也只募得几十元现洋,维持不了几天,便又打不开门了。以后又想了些办法,收效也不大。真正解决问题,是我去香港开会,民革中央给了我六百元港币,李济深送了一百元,我带回武汉投资于华中轮船票局,才彻底解决了经费危机。

“精诚新闻社”作为民革、民促、民联的外围组织,在新闻战线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并利用其合法地位,掩护民主党派

和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1、团结新闻界，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

1947年，我以“精诚新闻社”社长的身份，发起组织了“汉口市新闻通讯社联谊会”；参加单位有二十多家私营新闻社。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徐公仆（武汉通讯社社长、民革筹委）被推举为会长，办公地址设在汉口民众乐园二楼。这年“九·一”记者节，我便利利用联谊会名义，借用“银都”娱乐场举行纪念会。到会的有：导言通讯社的童丽生、亚新通讯社的黄光磊、国民通讯社的黄潮如、盖世通讯社的邓耀松、和平平报的刘威风等五十多人。会议倡议新闻界同仁联合起来，以笔为武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斗争。会后，还以联谊会的名义出版了专刊。

1946年隆冬，大雪纷飞，可汉口市警察局却下令拆除聚居在汉口流通巷、肖家巷、集家咀、鲍家巷、大小新码头、咸宁上下码头、龙王庙、米厂、四宫殿等处的五、六百家棚户，使近五千余饱受战乱和流离之苦的难民，面临沦落街头的悲惨境地。经过磋商，我们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当局开展斗争的大好时机。于是发动这些地带的保甲长带领群众，每次几百人不等，分头分批先后到省市府门口请愿、示威，一直僵持了半个多月。同时，我们又接受棚户的委托，向汉口各新闻单位求援，联名向南京政府申诉，并发动大量群众，在街头拦截来汉视察的国民党要员刘文岛的小汽车，向其控诉。刘迫于群众压力，在请愿书上签写了“暂缓拆除”四个大字，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2、掩护民主党派和中共地下党成员开展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强化其统治，和推行所谓的“戡乱反共”，在国统区大肆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和工作证制度，时常进行检查，给民主党派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活动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我们印制了许多“精诚新闻社”的特约记者证，并从在新安区、